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



413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

赵景深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25,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统一书号: 10186·502 定价: 1.70元

前 言

在我国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中，古典小说和戏曲占有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于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无论是资料的搜辑、考证或是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探讨，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虽然在十年动乱时期，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包括小说、戏曲在内，一度陷于停顿，但是经过拨乱反正后，古典文学研究又恢复了它的生机，并且呈现着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的编辑出版，就是为了适应这一学术领域发展的需要。我们希望通过论集的出版，使一些研究成果和论著能够及时和读者见面，从而促进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在这同时，我们也收录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藉以增进中外学术交流。

在论集出版的时候，我们恳切希望古典文学研究者、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我们以后在继续出版论集时，使内容能更臻完善。

赵 景 深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次

戏 曲

前言

- 读《千忠录》 周妙中(1)
- 李玉剧质疑 冯沅君(12)
- 略谈明清水浒戏的思想特点
- 兼与小说《水浒传》比较 金宁芬(23)
- 《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小记 王季思(40)
- 《录鬼簿》疑析 刘念兹(44)
- 臧懋循和他的《元曲选》 徐朔方(51)
- 《勘吉平》
- 元剧斟疑补之三 严敦易(83)
- 谢堃和春草堂四种曲
- 清代戏曲家考略之一 刘世德(94)
- 仲振奎与吴镐
- 清代戏曲家丛考之一 陆萼庭(111)
- 黄燮清及其《倚晴楼传奇》 蒋星煜(115)
- 宋元戏曲小说中的负心型故事及其后来 邵曾祺(127)
- 昆曲渊源 胡忌(136)
- 从昆剧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展望将来 陆树仑 李平(154)
- 南戏研究的新途径
- 《南戏新证》序 赵景深(182)

小 说

- 《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和曹雪芹的文艺思想 应必诚(190)
- 《世说新语》思想艺术散论 郭豫适(214)
- 《汧国夫人传》笺证 周绍良(232)
- 李复言及其《续玄怪录》考辨
- 兼论其《辛公平》所讽“上仙”者为宪宗 李宗为(257)
- 关于“说话”四家和合生 陈文申(268)
- 三国故事在元代
- 兼评《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原作说
- 陆树仑 金曾琴 朱利英(279)
- 元本《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形成
- 从猴行者到孙行者
- [日本]磯部彰作 赵博源译(301)
- 略论《聊斋》对前人作品的加工与改造 孙菊园(328)
- 小说《胭脂》和《胭脂舄》传奇 车锡伦(336)
- 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 顾国瑞 刘辉(344)
- 试论晚清革命派的小说观 黄 霖(366)
- 汉译《佳人奇遇》纵横谈
- 中国政治小说研究札记
- [日本]山田敬三作 汪建译(384)
- 施耐庵笔伐二潘 喻 蘅(405)
- 说林人物小志 郑逸梅(409)
- 编后记 (413)

读《千忠录》

周妙中

“家家‘收拾起’，户户‘不堤防’。”这句话是昆曲演员和爱好者的口头禅。它说明了《千忠录·惨睹》和《长生殿·弹词》（“收拾起”是《惨睹》唱词第一句的前三个字，“不堤防”是《弹词》唱词第一句的前三个字。）是剧坛最流行的两出戏。《长生殿》的作者洪昇为了创作这部传奇“断送功名到白头”，却也因此享了三百年盛名。可是《千忠录》这部杰作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还没有弄清楚。

《千忠录》也叫《千鍾禄》或《千忠戮》，曲白文字豪放激昂，剧本情节惊心动魄，它所以脍炙人口三百年决不是偶然的。有的学者认为：不是亲身经历过改朝换代的大动荡的杰出作家，是写不出这样使人百看不厌、永志不忘的作品来的，从而认为它就是李玉所作的《千忠会》。这些话的前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因此断定出于李玉之手，还缺乏足够的证据。《重订曲海总目》、《传奇汇考标目》、《剧说》、《新传奇品》、《今乐考证》、《曲目新编》、《曲录》等书所著录的李玉作品都有《千忠会》，但没有一部写作《千忠戮》或《千鍾禄》或《千忠录》的。各种曲谱也未有写作《千忠会》。

《千忠录》传本极少，过去大家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曲谱（如《昆曲粹存》）中所选的几出折子戏，写文学史、戏曲史的人所根据的也仅仅是这些折子戏。大约只有傅惜华旧藏旧抄本（今藏戏曲研究所）为唯一的完帙，它还有个很可宝贵的地方，就是在卷末有一行字，写道：“康熙戊子年（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六月朔东海子超置造也可歌”。这一行字的笔迹墨色都和剧本本身不同，决

不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写的。书口上有“徐子超”三个大字，因多次翻阅，墨迹已经若有若无了。这两点很值得注意，“东海”应是地名或徐子超的字或号。“可歌”是称道剧本写得很好，适合演出或清唱。关键在“置造”二字，有的人因深信《千忠录》为李玉作品，把这二字理解为抄写。笔者不敢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置造”应作“创作”解释。这一词在古典剧作中也曾出现过，例如《荆钗记》第八出《受钗》道白中有：“你便说(荆钗)何人置造？甚人遗下的？”这个“置造”就是制造的意思，也就是创作的意思。可能是得到这一抄本的人知道剧本的作者和写作时间，写上这么一行记载。因此笔者认为《千忠录》的作者名叫徐子超，字东海或东海人，于康熙四十七年六月写成。虽然这只是个孤证，却是二百年前的人直接写在剧本上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知道：李玉字玄玉，一作元玉，号苏门啸侣，吴县(今苏州)人，和当时许多剧作家都是好朋友，并时常合作写剧本。可是从未见到他和徐子超有往来的记载。而且《千钟录》创作较晚，康熙四十七年李玉早已与世长辞了。关于李玉的生卒年，没有见到确切的记载，只能从一些材料得到一个大致的年限：万历中叶刊印的《群音类选》收录了《洛阳桥记》的片断曲文，上述各种曲目李玉作品中都著录了《洛阳桥》，二者很可能是一种剧本。若果如此，李玉在万历中叶即已有戏曲问世了。可是有人认为李玉是清朝人，和《洛阳桥记》无涉。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李玉的前半生是在明朝度过的。他创作的剧本多达三十种左右，并完成了《北词广正谱》的编写工作，一定是个享高龄的人。他所创作的《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四种曲刊印于崇祯年间，那时他肯定已是个中年人了，所以他的生年当在万历年间(1573—1619)。《南音三籁》李玉序写于康熙六年(1667)五月，这时他尚健在无疑。从崇祯年间(1628—1643)至康熙六年少则已有二十余年，多则达四十年之久。由此可断定他写序时已到了老年了。从万历初年至

康熙六年不过九十年左右，所以李玉生在万历初年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生在万历初年，到万历中叶（约万历二十年至三十年之间）刊印《群音类选》时，应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那末《洛阳桥记》出于李玉之手是可能的。但是说他康熙四十七年尚健在是不可能的。这就排除了李玉和徐子超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从剧本内容来看，命名为《千忠会》似乎也不甚切题，也可说明《千忠会》不会是《千忠录》的别名。

我们知道：昆曲发展到明末清初，已进入了全盛时期，在剧坛占据了正统的地位。同时，由于清初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清朝统治阶级残酷地压迫汉人，尤其是具有反对民族压迫思想的汉族知识阶层。所以那时的文人怀才不遇是很普遍的事情。于是盛行的戏曲就成为他们发泄牢骚的工具，施展才华的园地。和清朝统治阶级的愿望相反，尖锐的民族矛盾，无情的阶级斗争，动荡的社会现实，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激发了他们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感情。许多作家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从不同的角度，曲折地抒发了反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情感，倾吐了广大人民群众郁积在内心深处的痛苦和义愤，写出了不少杰作。这些剧本中的大多数贯穿着一条主线——体现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残酷现实，有时甚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历史资料的旁证。

在我国历代戏曲作家中，有不少无名英雄。在清初戏曲作家中，无名英雄为数更多。除去一般人轻视戏曲的因素外，作者还有逃避文字狱的考虑。尤其是怀有强烈地反抗清朝统治阶级思想的明遗民，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而又不愿为官不想出名的隐士。因此认为《千忠录》只有李玉才能写得出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而我们更不必因为找不到作者生平的记载而否定他的著作权，更无须因为弄清此剧并非出于名家之手而感到遗憾。

令人遗憾的倒是这样一部杰作没有一部完整的刊本或抄本传世，《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所收的是两个本子拼接起来的，上卷不

分出,经过分析得知卷首佚失了六出。连过去经常有人演唱的《奏朝》、《草诏》都已不存。傅惜华旧藏旧抄本虽是完帙,而抄写不讲究,又未写明出目。经与《古本戏曲丛刊》本及各曲谱对照,除第二出至第四出和第十四出出目待考外,可得知廿一出出目:

第一出	开场	第二出	□□	第三出	□□
第四出	□□	第五出	议和	第六出	烧宫
第七出	披剃	第八出	奏朝	第九出	草诏
第十出	抄村	第十一出	惨睹	第十二出	劫装庙遇
第十三出	双忠	第十四出	□□	第十五出	里首
第十六出	进香	第十七出	虎救	第十八出	搜山
第十九出	打车	第二十出	法场	第廿一出	宫会
第廿二出	索命	第廿三出	遇赦	第廿四出	归宫
第廿五出	团圆				

建文皇帝是个懦弱无能的庸人,根本不配做一国之君。可是在明初,由于封建正统思想已深入人心,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造成了政治上的大动荡,给国家人民带来了灾难,最后永乐用高压的办法取得胜利。这件事经过三百年时间,到清初本已成为历史陈迹,而作者偏偏要选择这个题材从事写作,不过是借此发泄英雄穷途之哭,倾吐明亡之痛而已。它所以深受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主要是因为这个缘故。剧本名称存在三种写法,三百年之久没有人刊印问世,过去经常在舞台演出的只有《奏朝》、《草诏》、《惨睹》、《劫装》、《庙遇》、《双忠》、《打车》等出,没有见到上演全本的记载,大约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由于《千忠录》只有一部完帙保存下来,读者不易见到,让我来将剧情介绍一下,第一出副末开场白写出全剧梗概:

“靖难忠臣,仲彬史氏,翰林程济英豪。金川门献,削发共潜逃。十族孝孺忠烈,亿万命,泪湿空宵。荆黔界,牛吴代死,忠义实堪褒。滇南逢震直,擒君囚解,义责餐刀。迨榆川遭变,

重返官寮。解纲团圆骨肉，明哲士天际飘摇。《千忠录》淋漓慷慨，聊以续《离骚》。”

剧演燕王靖难，相国方孝孺四远征兵勤王。都御史陈瑛纳款燕王，京师十分危急。群臣议论纷纷，没有一致的主张。方孝孺决心坚守城池。史仲彬将妻子遣送回乡，以身许国。程济将女儿托与苍头程忠夫妇，自己准备下道士服装，设法救建文逃走。明太祖朱元璋的女儿、燕王的妹妹庆成公主劝燕王回军，以长江为界，各自为帝，燕王不听。燕王兵至京师，宫中起火，建文的妻子马后投火自焚死，临死前劝建文暂避其锋，以图恢复。从前，洪武临终时付一篋与建文，告诉他如果遇到大难时方才可以打开观看。到了这大难临头的时候，建文开篋一看，内有僧衣、僧帽、僧鞋、剃刀、度牒一纸、白银十两。于是剃光头发、穿上僧人服装，与程济由暗沟逃出。

燕王入宫，见到被火烧焦的马后尸身，以为建文已死，以礼殡葬。将六宫杀尽，改年号为永乐，把三个皇子禁锢高墙，太后废居陵上，三皇弟削去王封。又把左班官员姓名写成一榜，题为“奸臣”，悬挂在朝门外，以齐泰、黄子澄等五十一人为首，其余不可胜纪，轻者合族全诛，重者夷九族。燕王有意利用方孝孺的名声制造舆论，请他写诏书，孝孺不肯，大骂燕王。燕王大怒，夷孝孺十族。陈瑛官复原职，千方百计为燕王出谋划策，杀戮异己。他指明所葬的尸身是马后尸身，怀疑建文隐藏在史仲彬家里，派兵围住史家搜捕，不见，将仲彬逮捕入狱。

建文和程济打算去湖广、贵州、云南，途中见到许多伤心惨目的情况，痛苦不堪。行李又被恶僧劫去，欲行短见，程济苦劝，方才回心。又遇大雪，入古庙避雪。吴成学、牛景先万里天涯寻觅建文，恰好在古庙相遇。燕王差人各路追袭建文，张玉追至，吴成学扮作建文，牛景先扮作程济，自刎死，以打消燕王必要擒获建文的念头。不想燕王发现首级是假，画影图形，在各个关口、渡口严行

缉捕。

这时程忠已将实情告知程济的女儿。地方发现程女在程忠处，将她送官，与程忠夫妻一同解京。在这以前，庆成公主的驸马殉节，庆成公主修道，进香途中，遇程女喊冤，公主把她收养起来。

建文在云南鹤庆山中结一茅庵，住了十二年之久。一日，忽然发现史仲彬死在地上，原来仲彬为了逃避关口的盘诘，扮作乞丐，寻找建文，途中被猛虎吓死的。救活之后，方才得知离朝后许多情况。

严震直捕获了建文，打造囚车，押解回京，途中，程济对震直和他的部下讲说了许多大道理，军士皆散去，震直自尽，建文又得保全。永乐闻知建文得救，大怒，使陈瑛捉史仲彬全家，欲立即处斩。庆成公主奏了一本，谓没有确凿证据证实救建文是仲彬所为，仲彬方才保住残生，和他的儿子一同起解庄浪卫充军，他的妻子文氏没入公主府中服役。最初，程、史二家订有婚约，到这时仲彬的妻子与程济的女儿婆媳相会，程女方才知道他的父亲还活在人间。

永乐封张玉为荣国公，食禄千锺。升陈瑛任兵部尚书，以为羽翼，政权已经巩固了，却仍不肯放松缉捕建文。洪武和方孝孺鬼魂托梦永乐，严厉地斥责了他，又有许多冤鬼向永乐索命。永乐惊醒，气绝，被唤醒后，回辕收兵，不再追寻。

直到永乐、洪熙死后，宣德即位（建文于宣德为叔侄），建文才敢出头露面，回朝自首，经盘问后证实，叔侄相认，杀陈瑛全家，史仲彬官复原职，他的儿子也得贵显。依庆成公主奏，仲彬的妻子给与宁家，程济的女儿给与原配。

程济在女儿举行婚礼的时候来会亲翁，以全朋友之谊，见一见女儿，以完父女之情。然后独自进入深山出家，不再过问人世间的的事情了。

按《明史·本纪第四》恭闵帝“允炆，懿文太子第二子……建文元年秋七月燕王棣举兵反，……四年六月……都城陷，宫中火起，

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钩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有的笔记中写建文最后回到京师，被留在宫中，大家称他为“老佛”。剧中写扮作僧人逃走，最后返回明宫是有根据的。《明史》又说：“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後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大清乾隆元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从这段记载来看，后来被留在宫中之说恐不足凭信，仅野史有此记载。

《明史·方孝孺传》“……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痛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勿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于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节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由。’时年四十有六。”剧中所写孝孺力主守京城及拒绝草诏等经过，基本上与《明史》相符，他和成祖的对话，更直接地写入剧中。只是诛十族事本自野史，恐怕不是事实。若果如此，《明史》不会没有记载，作者这样安排是为了强调燕王的凶狠残暴。

其他史仲彬、程济、牛景先、严震直等人《明史》都有记载，《曲

海总目提要》已作了分析，不详谈了。吴成学《明史》没有记载，但剧中忠臣大多实有其人，吴氏想来也不会是子虚乌有一流人物。严震直本是病卒在泽州，作者的安排或许是为了突出程济的忠心，以便完成《搜山》、《打车》等精采的折子戏。

据《明史》“以战舰降燕”的是御史陈璵，剧中写陈瑛纳款，估计是因为陈璵在经济方面作过些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作者有心为贤者讳，也可能还有其他考虑，没有直接写上他的真实姓名。

总之，以《千忠录》情节和《明史》比较，可知作者虽没有象孔尚任，董榕那样下大功夫去作考据，以写史书的严谨态度创作剧本，并且穿插进去一些莫须有的人物（如史仲彬的妻子，程济的女儿）和情节（如史、程二家结亲），却也参考了《明史》和野史（尤其是《致身录》），是个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和文艺修养的人。增加人物、情节无非是为了便于组织材料，安排角色、便于演出。作为文艺作品，这样处理问题是应该允许的。而且细读此剧，可以肯定地说作者是个非常内行的戏曲作家。戏曲是综合的艺术，杰出的戏曲作家也必须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但要擅长诗词歌赋，而且必须精通音乐，懂得舞台演出效果，能够塑造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物。更重要的则是能具有远大的目光、雄伟的抱负、高尚的品格、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的胸怀，方才能够着眼于国家大事，选择有意义的题材进行创作，达到教育人民、鼓舞群众的效果，不被身边琐事、儿女私情甚至低级趣味所纠缠而不能自拔。《千忠录》的作者称得起是符合这些要求的。剧情这样复杂，他只用了二十五出，这在明末清初的传奇中是最短的，这个“短”是很大的优点，它使得剧情紧凑，无懈可击，演员不会十分劳累，观众也不会感到厌烦。剧中对人物的刻画也有血有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塑造了许多忠臣形象，他们一个个都是忠心耿耿，为国忘家，甚至不惜家破身亡。但他们却又各有独特的个性和处世态度。方孝孺突出了他的视死如归，不畏强暴。吴成学、牛景先强调了他们的当机立

断，舍生取义。严震直表现了翻然悔悟，悬崖勒马。史仲彬、程济更是百折不回，始终如一；但在建文回朝以后，史仲彬依然在朝为官，为明室效力，程济则看破红尘，隐居山林，两人体现出完全不同的处世态度。对于齐泰、黄子澄和景清的死，只在《草诏》一折中一笔带过：

“（内）闲人站开。（太监）老相国，行刑的来了，站过一边。（二刽子押齐、黄上）呔！走吓！（齐、黄）老相国请了。（方孝孺）吓，原来是齐、黄二公。（齐、黄）不敢！（方）好！死得好！（齐、黄）老相国，我二人要长别你了。（方）二公先请，俺方孝孺随后就来。……”

“（二刽子）呔！走吓。（太监）老相国，又有行刑的来了，再站过一边。（方）吓！这是那个的尸首？（二刽子）这是景御史尸首，将他剥皮揼草，还要把他凌迟哩！（下。方）嘎！人已行刑过了，还要将他凌迟么？……”

着墨不多，对齐、黄的视死如归，景清的惨死，燕王的狠毒、方孝孺殉国的决心交待得一清二楚，而它的效果并不减于用几折篇幅来写他们的事迹。这种对头绪繁多的史实，作适当的剪裁，正是写历史剧必须使用的好办法。在这里可看出作者技法的高明和经营的苦心。

此外对陈瑛的忘恩负义、趋炎附势，想方设法出卖同僚以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燕王的凶残暴虐，千方百计地杀戮异己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也都描绘得入木三分。所以能够紧紧地抓住观众和读者的心弦，使观众或读者的情感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转移。全剧自始至终，颇多声情并茂的好曲子，文字和音乐都能够充分地表达出剧中人的内心活动，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和充沛的情感，使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愉快中又深深感受到作者在清廷残酷镇压下无可如何的隐痛。

剧中可以称道的地方指不胜屈，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举其中

最脍炙人口的《惨睹》一折来谈一谈。《惨睹》写的是建文与程济扮作一僧一道逃亡，沿途看到被杀害官员的首级装车运走，这些官员的妻子儿女在押解途中备受凌辱与毒打，甚至弃职的官员也被捉去惩办，使建文和程济百感交集，万分悲痛。短短一折戏，包括了这样多的内容，在情节安排上作者必定是颇费匠心的。文字、音乐和人物刻画等方面也称得起是不可多得的好曲子。例如第一支曲子〔倾杯玉芙蓉〕：

（建文唱）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白）我自吴江，别了史徒（指史仲彬）一路登山涉水，夜宿晓行。一天心事，都付浮云；七尺形骸，甘为行脚。身似闲云野鹤，心同槁木死灰。（唱）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白）程徒。（程济）大师。（建文）前面是哪里了？（程济）是襄阳城了。（建文）嘎！是襄阳城了，唉！（唱）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曲文第一句就提到了“大地山河”，俨然帝王口吻；接着就是“四大皆空”，说明他是个和尚，开头十五个字就交待出和尚皇帝的身份。下面很形象地烘托了气氛，抒发了情感。逐字逐句都表达了建文对壮丽江山的无限留恋和他自己不幸遭遇的深切感慨。然后通过他看到的一桩桩令人伤心惨目的情景，暴露了燕王夺取政权手段的毒辣。最后的结尾也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本领：他们正走着，听到了野寺钟声，这位生长深宫之中的皇帝，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上朝时的景阳钟：

吓，程徒，景阳钟鸣了。（程济）此乃野寺钟鸣，非景阳钟也。（建文）嘎！（程济）唉！（建文唱）错听了野寺钟鸣，误景阳。

这样深刻的心理描绘，不是一般手笔所能写得出的。

这出戏共用了八支曲子，文字精练豪放，音调高亢激昂，演奏

起来必然会使歌唱者不啞于喉，听众也觉得大快于耳的。每支曲子最后都用“阳”字结尾，很巧妙地把“襄阳”、“朝阳”、“斜阳”、“云阳”、“渔阳”、“睢阳”、“南阳”、“景阳”这八个带阳字的典故或词汇组织得天衣无缝。因此这出戏又名《八阳》。

在欣赏此剧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作者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作者是封建社会知识阶层的一员，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必然要反映到他的作品之中的。对方孝孺、吴成学、牛景先的“忠”未免强调得太过分了，已经达到愚忠的程度，作者却在尽情地歌颂。洪武和方孝孺的托梦、冤鬼的索命，虽是梦境，也属蛇足。

一次，笔者偶然和一位京剧演员同志谈起目前上演剧目还不太丰富的问题，他说现在剧团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剧本。其实，在我国剧坛尚有大量优秀遗产没有挖掘出来。如能充分利用诸如《千忠录》这类古典剧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改编上演，或利用其中的精华——如戏剧人物的刻画、曲牌音乐的使用等等为借鉴创作新剧，必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繁荣今日的剧坛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也是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之一。

李玉剧质疑

(《明代文学》讲稿之一。一九六四年用)

冯沅君遗作

李玉事迹

(一) 关于李玉的生卒年,我曾订于1590?—1660?。中山大学中文系校勘《清忠谱》,与此同。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作1591?—1671?。

(二) 李玉与申家的关系:我提出李玉为申家家人时,不少人反对,可是我相信是这样。第一、《南北词简谱》油印本书眉批注:“北词李玄玉北词广正谱。苏人,其父为沈(申)用懋仆。”申用懋,万历进士,崇祯初,官至兵部尚书,是相国申时行的儿子。“批注”疑是吴梅讲课时,学生笔记。吴说必有所本。第二、也许有人以为家奴家的子弟,如何在文学上有这样高的造诣。要知道,豪门的家奴尽管在主人面前是奴仆的地位(受驱使,被虐待、失去自由),可是他的家庭往往颇有财势,超过中人之家。例如《红楼梦》第四十五回所写赖大的儿子作县官。第三、申家广蓄声伎。据郑桐庵《周铁墩传》说:“吴中故相国申文定公家,所习梨园为江南称首。”似此记载不止一处。他家不仅有男艺人,且有女艺人。无名氏《笔梦叙》记钱岱事,曾说到钱家的女教师:“女教师沈娘娘,苏州人。善度曲,年六十余,探喉而出,音节嘹亮,衣冠登场,不减优孟。”(石印《说库》本,页三)李玉出自这样声伎冠江南的豪门,这对于他后来戏剧上的成就自然有大关系。而且正因为如此,他的剧作不是一般士大夫所作的案头剧,而适于演唱的。《永团圆》序说,当时稿甫